

● 新闻传播学

论西方新闻媒介与民主政治^{*}

车 英¹, 吴献举²

(1. 武汉大学 文科学报编辑部, 湖北 武汉 430072; 2.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车 英(1954-), 男, 河北望都人, 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教授,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系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学、比较新闻学、新闻法学、国际私法学等研究; 吴献举(1975-), 男, 河南平舆人,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系硕士生, 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学、比较新闻学研究。

[摘 要] 西方新闻媒介与民主政治是相互依存, 相互促进的关系。资产阶级在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中推动了民主事业的发展, 新闻媒介在公民参政议政、监督政府、匡正时弊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同时, 民主的进步是新闻媒介发展的保障。

[关键词] 西方新闻媒介; 民主政治; 新闻自由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3-0363-07

西方新闻事业诞生在封建社会末期, 与其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需要息息相关。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推翻封建统治, 打破封建思想的束缚, 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因此迫切需要传播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宣传观点、制造舆论, 以促进社会的变革。在争取民主和促进变革的过程中, 资产阶级革命家提出了“出版自由”的口号, 并为争取出版自由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资产阶级争取出版自由斗争的胜利, 有力地促进了新闻事业的发展, 而新闻事业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认为, 新闻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 属于思想上层建筑范畴, 它由该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 并为经济基础服务; 民主属于政治上层建筑范畴, 它也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 并为该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正如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所说: “自由报业与民主教育, 是民主政治的车之双轮, 鸟之双翼。”^[1] (第504页) 由此可见, 资产阶级必然要在实力壮大后争取“发言”的权力。政坛上的“发言”只是一个方面, 而通过号称“无冕之王”的新闻媒介的“发言”是直接面向大众的, 其影响力则更大。

西方的新闻媒介多为私人所有, 资本家们要“发言”, 又要赚钱, 把媒介作为企业来经营, 把握“发言”和获取利润是资本家经营媒介的两大根本目的, 以期“双赢”。但是, 新闻媒介并非生存在真空, 它的利润之获得是与社会的各个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它与社会的运作浑然一体, 相互掺杂, 其本身就是政治、经济、思想意识等社会各要素运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毕竟新闻媒介是反映社会现实的, 必然会受到现实社会的影响和制约, 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文化价值、社会经济结构等决定了新闻媒介的运作和价值取向。因此, 西方新闻媒介在维护和延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意识形态, 促进商业经济发展等方

^{*} 收稿日期: 2003-02-08

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新闻媒介是相对独立的,有着相对的自由权,因此,它又具有监督政府、促进民主之功能。此外,新闻媒介也在维护正义、揭露邪恶、传播和鼓励新的和进步的价值观念、推动社会前进方面起着重大作用。

西方社会的民主进步有新闻媒介的功劳,西方社会的民主倒退也有新闻媒介的责任。新闻媒介是民主的鼓吹者和促进者,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人们在“民主”本意的基础上,又赋予了许多新的内容。现实民主政治的定义应为:政治事务的最终权力理所当然地属于人民——政府的决策必须以民意为依据;政府官员的行为与大多数公民的意见高度一致;人民有权利也有责任影响政府的决策,等等。

在西方国家,新闻媒介始终处在争取民主斗争的前沿,记者被称为“为民主高擎火炬的人”。新闻媒介秉承着公平、正义的原则,大胆揭露各种反民主、反人类的行为,使一切丑恶现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新闻媒介现已成为促进社会良性运作的社会监督机制中的重要一环。新闻自由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在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中促进了民主的发展。在世界近代史上,自从尼德兰人民揭开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后,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先后进行了具有世界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以前,资产阶级报刊毫无例外地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压制。各国封建统治者都有严厉的管理措施,他们一方面出版官报,为自己的政治需要服务,另一方面又通过出版许可制、内容审查制以及施加各种政治制裁手段,压制异己思想和“非我”信息的传播。而作为封建秩序叛逆者的资产阶级报刊,在当时极度困难的处境下,时而合法、时而非法地谋求生存和发展。它们举起“出版自由”的旗帜,冲破封建统治,传播群众革命信息,宣传民主自由观念,积极推进革命进程。这一时期出现的“出版自由”口号,是资产阶级战斗实践的锐利武器,也是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重要成果。

然而,这些在革命中推波助澜的资产阶级报刊,在大革命胜利后,便很快变成了新的统治阶级的舆论工具。但是,由于革命的彻底程度不同、民主政治实现情况不同,各国资产阶级报刊的实际处境则必然存有很大差别。有的国家对封建传统破坏不彻底,新闻出版仍受到诸多限制,报业发展比较迟缓;有的国家政局多变,时有封建复辟或专制政权出现,报业发展屡屡遭受挫折。因此,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远没有结束,而且已演变成为西方政治民主化进程中不断延续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争取新闻自由斗争的不断深入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逐步完善,资产阶级开始在法律上确定新闻自由的原则。1791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一修正案》,第一条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订……法律……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从此,“给予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宪法保护覆盖所有的传播手段。第一修正案已经被扩展到了人们在18世纪时连做梦都不曾想到的新传播媒介,譬如广播车、电影、无线电广播、电视以及有线电视。”^[2](第20页)这的确是一次意义深刻的革命,它意味着真理不再属于任何一个执政的党派,而是“属于全体选民,是个人理智的内在部分”,而不再属于国家的权力当局^[3](第306页)。“出版自由”从最初的革命思想到最终形成法律条文,是资产阶级不断努力斗争的结果。

二

新闻媒介使社会事务透明化,可帮助受众行使知情权。在西方,知情权思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先由新闻界提出来的。

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民主权利,是公民行使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利的基本前提,也是公民行使参政议政权利的基本保障。没有公开就没有知情权,而新闻媒介是公众了解各种社会事务的重要途径。当然,其前提是新闻媒介拥有了解社会事务的权利。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西方国家政府常常通过新闻媒介把公共事务公之于众,新闻媒介也常常设法探知政府的政务。

美国政治学家道尔(Robert Dahl)说,大众传播媒介应帮助人民对公共事务达到“充分的了解”。道尔认为,这是民主政治的标准之一。他说,人民应有“充分的了解”去“发现”自己的喜好,不认为人民有先天的喜好。因此,他认为政治教育的功能在塑造人民的政治判断力和政治喜好^[4](第68页)。

为“塑造人民的政治判断力和政治喜好”,西方媒介常常开展对公共政策的讨论。通常,在政策尚在规划阶段,媒介就将公共事务问题提出讨论,使社会大众有机会参与讨论,使政府有机会听取大众的意见,作为规划政策之参考;新闻媒介甚至在公共事务问题尚未获得公共“议程地位”之前就提出讨论,使该问题成为公共议程,引起决策者的重视;在政策的执行中,新闻媒介也常常密切注意民意的反应,及时地反映民意,进而评价决策的效果。正是由于媒介使社会事务透明化,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则大为减少,从而使人民的正当民主权利得到较好的保障。

新闻媒介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对政府权力的运作起着监督作用,维护着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英国自1538年开始争取出版自由到19世纪中叶英国报业争取到新闻自由,是英国民主政治的成形期,通常被认为是英国新闻自由与现代民主政治的“摇篮”。当时著名学者福兰塞斯·汉特称新闻事业是统治大英帝国的贵族、僧侣与平民代表以外的“第四阶级”。因英国国会的上院由贵族、僧侣代表组成,下院由平民代表组成。但当时不论哪一个政党组阁,除必须获得上下两院的支持外,还必须得到《泰晤士报》的支持。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新闻顾问的道格拉斯·卡特称报业为政府行政、立法与司法以外的“第四部门”。他认为,美国是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但如无自由报业反映舆论、监督政府,民主政治是无法运行的^[1](第504页)。

西方新闻媒介始终把总统和政府各级官员视为信息的主要来源,政府则通过媒介向公众宣传施政意图、政策及具体行动等,影响舆论,争取支持,这决定了媒介同政府互相依赖的密切关系。但是,由于媒介和政府各自的目的不同,又互相独立,所以两者既合作又对立,关系并不总是亲热和谐的。政府希望媒介完全接受政府的政策主张,只报道“利我”而非“非我”的消息,而媒介认为自己是独立的,有责任站在公众的立场上监督政府,对政策及官员提出批评。西方媒介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而新闻又总以负面报道为卖点,所以那些批评政府的揭丑新闻总是媒介的“永恒主题”。为了扩大发行量或收视、收听率,新闻媒介总是注意搜寻政府管理不善、腐败无能等方面的现象加以揭露。政治斗争的各方也常常给媒介放出“小道消息”用来打击对方。

西方新闻媒介监督制政府的例子很多,最典型的要数“水门事件”了。《华盛顿邮报》的两名小记者锲而不舍,揭出水门窃听是白宫指使,最终迫使尼克松为避免被弹劾而不得不辞职。此事件之起因看似是一桩平常的入室窃听之小案,如果不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这两个不名记者寻根刨底地挖掘后台,美国的那段历史可能是另一种写法了。当然,“水门事件”的被揭露以及尼克松总统的倒台是有着极其深刻复杂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的,其因素是多方面的^[5](第115页)。诚然,被称为“国王制造者”(king-maker)的美国新闻媒介在总统及其他重要人物的沉浮中起着推波助澜和催化剂的作用。

再如:创刊于1872年的美国《波士顿环球报》曾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几乎同时刊登“五角大楼文件”,因而引起全国注意。该报于1967年5月成为第二家反对越战的大报,1973年10月成为美国第一家要求罢免尼克松总统的大报^[6](第288页)。

总之,新闻媒介对政府的监督有助于促使政治透明、政府清廉、保障和促进民主化进程,同时也可防止官员违法行使权力,维护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三

新闻媒介是政治协商的重要通道,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手段,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力的主要渠道之一。民主政治是一种制度,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但这种制度、观念、生活方式的建立,要有新闻媒介的启发、鼓吹与支持。传播学者迪弗勒在他的《大众传播理论》中说:“大众传播行为是一种手段,是表明团体规范、运用社会控制、分配各个角色、达成共同努力,显现心愿期望,使整个社会过程不断进展而不辍。”他还认为,没有大众传播,社会就不能持续,人类社会生活就会戛然而止,原因就是大众传播以此通过信息的沟通与交流使不同阶层、不同种族乃至不同国度的不同的价值观念得以整合,使

人们消除历史和地理的距离,建立一个基本相同的价值观。人类社会持续和发展就是通过传播媒介的沟通交流,创造出相同的价值观的过程。

西方新闻媒介在使人们建立相同价值观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种价值观,主要是民主理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资产阶级不同于先前的阶级,他们不再诉诸传统方法(如暴力)获取合法性,而是更加注重意识形态的灌输。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经过长期研究发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历经数百年得以不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利用大众传媒把一整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诸如自由、民主、博爱、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个人主义等,普及到了社会,成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主流意识。在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中,新闻媒介是最为重要的中介,是联系政府与民众的桥梁。最为典型的是美国总统大选。选举前,所有候选人都要在新闻媒介上做广告,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所有的报道中,他们更看重的是电视记者的报道,因为电视画面可以把他们的形象活生生地带到千家万户,有的候选人还专门花钱到电视台发表演讲,以赢得选民的好感。民众也大都是通过新闻媒介了解候选人的,新闻媒介的舆论导向对选民的选举有很大的影响。另外,新闻媒介也是民众参政议政的讲坛。公民或公民团体可以利用新闻媒介来间接参与影响政府的活动。比如,公民个人可以在新闻媒介上发表对当前政局的看法,提出相应的建议;公民团体也可以通过大众媒介宣传自己的主张,呼吁政府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政策^[7](第 223 页)。

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重要的民主权利。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则十分重视人民的言论自由权利的表达。他说:“政府的基础是人民的意见,所以政府的首要目的就是捍卫人民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如果无报纸而有政府与无政府而有报纸,两者之间必选其一,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8](第 123 页)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人民可以在新闻媒介上发表任何言论,甚至可以批评总统,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曾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就是较为典型的一例。虽然西方媒介也注重维护国家利益,但这种维护采用的是疏导的手段而非压制不同的意见。

四

西方新闻媒介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并非始终起着推动作用,它在资产阶级民主进程中也有不谐音。在民主快步发展的同时,工业化国家的新闻传媒正在成为最尖锐的批评对象。这些批评主要针对的是新闻传媒追求轰动效应,过分渲染,小题大做,甚至操纵舆论。总体上说,一种不信任的风气正在占据上风,人们对从事新闻报道、传播和分析的机构越来越感到怀疑^[2](第 355 页)。新闻媒介公信力的下降会导致它的社会功能的退化,及对民主政治推动力的减少,甚至起阻碍作用。这是由新闻媒介自身及社会的运行机制决定的。但“从根本讲,媒体的影响力取决于社会本身,即它的组织和运作,并依赖于整个社会的势力网及公众舆论所信赖的引导者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9](第 154 页)。

1. 西方新闻媒介由广告商控制,这使得一些媒介成为垄断资本家的工具和代言人。

资本主义企业通过在新闻媒介上做广告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同时也给新闻媒介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从而支持了新闻媒介的发展。资料表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闻媒介主要靠广告收入获得巨额利润。西方国家报纸收入的 75%来自广告,广播电视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广告。广告收入名副其实地成为“媒介的血液”,成为新闻媒介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命脉。

但是,新闻媒介也常常因疯狂追求广告收入而陷入依赖广告商的境地。商业性的功利目的往往使广告客户惟利是图;巨额的广告费又容易诱使某些新闻媒介见利忘义,导致虚假欺骗、不负责任、轻浮肤浅、低劣庸俗、污染社会环境、腐蚀受众心灵的广告屡见不鲜,甚至很大程度地影响了舆论的客观公正性。“新闻界的经济利益,经常与广告商的利益相吻合,但却与记者完全独立自由地报道事件的理念相冲突。”^[10](第 358 页)为了获得广大的广告源和丰厚的广告费,新闻媒介不得不唯垄断资产阶级马首是瞻,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都要考虑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广告商常常对广告的内容进行审查,如果发现新闻报道中有

对自己不利的内容,他们便以抽走或威胁抽走广告的方式来封杀那些内容。例如,一个制片人摄制了一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伦堡审判的纪录片,但这位可怜的制片人不得不将带有“毒气室”的词组统统删去,因为赞助该纪录片的一家煤气公司有如此要求^[11](第105页)。新闻媒介对广告商惟命是从,严重地损害了新闻媒介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已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新闻媒介所秉承的民主与正义之初衷。

2. 西方新闻媒介的资本主义商业行为特征使得媒介只根据经济利益的需要来选择新闻,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民主的表达。

西方新闻媒介大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私营企业,为了盈利,这些媒介必须追求最大化的受众群,并以此吸引广告商。如此,离奇、凶杀、色情新闻便粉墨登场,“新闻,尤其是电视新闻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向小道消息和花边新闻靠拢,节目制作越来越肤浅。但电视网的负责人根据收视率的调查宣称这是受众所需,而电视制片人的最终目标就是想法设法粘住观众,以获得更多的广告收入。”^[11](第109页)

新闻媒介标榜自己不听命于政府、政党或利益集团,也没有宣传国家经济发展或社会进步的义务,一切新闻报道只对受众负责。新闻媒介自行决定如何选用素材和消息来源,对政府的话可以引用,也可以不引,可以全信,也可以不信。为了追求“卖点”,新闻媒介往往报忧不报喜,如灾祸、冲突、麻烦等便都可成为新闻媒介关注的焦点。

虽然这些负面报道也体现了媒介的社会功能,可以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批评,可以揭露邪恶,可以成为广大受众的“局部耳目”,但它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过杂过多的阴暗面报道会使人们产生消极悲观情绪;有暴力倾向的新闻会诱导人们去模仿,会使那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误入歧途,使社会犯罪率增高;色情报道则是对社会环境的污染。正如英国哲学家卡尔·波珀毫无迟疑地断定,新闻媒介已成为迄今最重要的力量或集团,达到形成对民主的真正威胁的程度。他坚持说,毫无廉耻地表现血腥和仇恨削弱了我们对暴力的抵抗力,在公民的心目中破坏了民主的基础^[3](第384页)。

3. 西方媒介的私人控制体制导致新闻媒介价值取向的偏见,这种偏见是同民主精神相悖的。

西方国家对新闻媒介的创办采取登记制而非审批制,任何人,只要具备创办新闻媒介的条件,都可以创办,而无需官方的批准。大部分媒介为私人所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介走向垄断,垄断资本家控制着媒介,从而使媒介成为垄断资本家的传声筒和“权力机构的啦啦队”。巨大的财团或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直接或间接干预新闻媒介的业务、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12](第141页)。而新闻媒介垄断集团资本家作为垄断资产阶级的一分子,尽管要争取大量的受众以获得广告商的支持,但在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方面却是毫不含糊的。因此,新闻媒介在新闻报道的价值取向上具有明显的偏见。如作为“真正的美国的意见领袖”的纽约新闻传媒,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几乎所有的意见领袖也都站在戈尔一边。……谁知道中西部的大众却投了布什的票,结果东部的意见领袖败在了中西部大众的手下。”^[13](第49页)

西方媒介虽然标榜“客观”、“公正”、“中立”、“均衡报道”、“有闻必录”,但在实践中,为消除新闻选择上的争论,相关主笔、主编人员常常把政府官员所从事的事务作为重要新闻,通过各种新闻手段加以强调,而普通民众所从事的事务则作为次要新闻,或根本不作新闻报道。因为新闻媒介常以政界人士所言作为新闻的导向,这就使得新闻报道带有官方和主流社会倾向。西方新闻界也常常发出警告说,只有有价值的事件才予以报道,但何为价值、何为新闻价值或何为有价值新闻,尚无一定标准。新闻媒介往往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官方的重视程度来界定某一事件是否有新闻价值,如种族歧视或环境质量下降等,因官方的不重视就得不到报道。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貌似有新闻价值者却实无新闻价值,而那些客观上需要报道以引起政府和民众关注的事件却无法报道。

西方新闻媒介价值取向的又一个偏见是比较难以觉察的但却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新闻媒介非但没有保持政治上的中立立场,反而悄悄在受众的头脑中注入了媒介拥有者和广告商的商业目的以及对资产阶级政治目的有利的价值观。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是国际新闻报道。西方媒介的绝大部分国际新闻都是按照西方国家统治集团的政治观点、经济利益、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新闻价值观来筛选、编写和制作的,所

以这样的新闻报道往往是表面的、片面的,甚至是歪曲的、带有诽谤性或煽动性的。西方新闻记者塑造的发达国家的形象,一般来说总是那么崇尚民主法律、尊重人权、不断提出和平倡议、慷慨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各种援助,等等。对比之下,相对而视,在西方记者的报道中,人们很少看到发展中国家的进步与发展,以及它们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所作的贡献,而总是见到政变、动乱、饥饿、冲突、暴力等。不少坏消息,则完全是西方新闻机构用于诋毁、中伤发展中国家而捏造出来的^[12](第 382 页)。

五

西方新闻媒介的发展与民主进程息息相关,可以说,没有政治的民主化就没有媒介的发展。美国有不少新闻学者认为,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14](第 10 页)。换言之,新闻为民主之声,民主乃新闻之力。从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看,在一定意义上讲,新闻是民主的产物,新闻自由是民主斗争的结果,正是人们对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的渴求与奋争,促进了近代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当资产阶级把知情权和出版权作为公民的一种民主权利去争取的时候,它们选择的斗争武器就是报刊,而确保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则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

1. 民主制度的不健全制约着新闻媒介的发展,民主制度的完善则促进新闻媒介的发展。

英国近代报业的发展过程很能说明这一点。英国近代资产阶级报业问世于封建统治后期,当时英王朝实行皇家特许制度,规定所有出版物均须经过特许,否则禁止出版。1586 年,“星法院”颁布特别法令,严厉管制出版活动,其中规定:一切印刷品均须送皇家出版公司登记;伦敦市以外,除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一律禁止印刷;印刷任何刊物均须事先请求许可;皇家特许出版公司有搜查、扣押、没收非法出版物及逮捕嫌疑犯的权力等等。在这种严厉管制下,英国当时的报业发展非常缓慢。

1640 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提出了“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政治思想,封建王朝的压制措施纷纷失效。1641 年 7 月,“星法院”被取消,英国报业第一次摆脱了封建桎梏。各种报刊和新闻印刷品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从 1640 年到 1660 年间就创办报刊达 300 多种。这些报刊一改过去只报道国外消息的状况,争相报道国内新闻。在形式上,尽管多数仍是书本式装订,但是第一页不再是封面图案和书名,开始改用报名面世,下面则直接登载新闻或新闻要目^[12](第 23 页)。

克伦威尔军事独裁时期对新闻出版又采取了严厉的管制手段。独裁政府颁令规定,除特许者外,一律不准出版印刷品,同时恢复了皇家出版公司,让其独占出版业。这样,革命初期一度兴盛的定期报刊纷纷消失或倒闭,最后只剩下效忠于独裁政府的两份官报。“光荣革命”后,英国资产阶级正式参与执政,实行民主政治,废除了旧王朝的出版法案。备受封建和独裁压制的英国报业和出版业重新复苏,“出版自由”的口号得到切实的贯彻,出现了一个新的办报热潮。

2. “新闻自由”观念已深入人心,任何扼杀新闻自由的行为都会受到人们的反对。

西方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民主制度已相当完善,新闻媒介的发展也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实现民主与新闻媒介发展的良性互动是新闻媒介追求的目标,但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一些人为的因素常常践踏民主,阻碍新闻媒介的发展,通常的表现形式则是用政策法令限制新闻自由,或是用收买利诱手段控制媒介等。西方国家干涉最多的媒介是国家所有的媒介,如“9·11”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美国之音”由于无视政府的警告,播放了访问本·拉丹的录像,其结果则是台长被撤职、经费被削减。

但历史的车轮毕竟已进入了 21 世纪。自 1644 年约翰·弥尔顿提出“出版自由”口号以来的几百年中,人们为争取出版自由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和不懈的努力,在崇尚自由、民主、人权的西方社会,逆历史潮流而动,限制新闻自由的行为必将为人民所唾弃。正如杰弗逊说:“我们的自由权利,系建立在新闻自由的基础上。”^[1](第 504 页)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自由、民主的西方社会;同样,没有民主,新闻自由就无从谈起。在许多西方国家的宪法中,都有保障新闻自由的条款。尽管西方国家的新闻自由尚有很大程度的欺骗性,并且受到金钱的制约和阶级的偏见,但把“新闻自由”作为口号提出来并在法律上加以规

范,确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

诚然,世界是多元的,任何政治都是其利益的体现。这就导致了民主的实施必然与现时政治的密切结合,决定了西方的民主政治本身的两重性和双重标准。2003年3月20日,美英两国绕开联合国,公然挑战国际法,打着“解放伊拉克人民”的旗号,动用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悍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伴随这次战争展开的新闻大战,把多种最现代化的传媒导入战争,尤其是属人类历史上首次对战争进行的电视直播,让世界人民直视战争、直感政治,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新闻传播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且从这一侧面较为充分地体现了民主事业的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李 瞻. 新闻学原理[M].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2.
- [2] [美]唐纳德·吉尔摩,杰罗姆·巴龙. 美国大众传播法:判例评析:上册[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 [3] [法]洛特非马赫兹. 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 [4] 马 华. 主义与传播[M].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
- [5] 车 英. 论美国新闻自由及其受控[J]. 武汉大学学报,1987,(2).
- [6] 辜晓进. 走进美国大报[M].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
- [7] 李良荣. 新闻学导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8] [美]埃德温·埃默里,迈克尔·埃默里. 美国新闻史[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
- [9] 巴 勒. 传媒与社会[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
- [10] 俞燕敏,鄢利群. 无冕之王与金钱[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11] 顾耀铭,等. 我看美国媒体[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 [12] 梁洪浩. 外国新闻事业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 [13] 刘 勇. 大追寻——美国媒体前沿报告[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
- [14] [美]詹姆斯·W·坎尼. 新闻教育错在哪里[J]. 国际新闻界,2002,(3).

(责任编辑 吴友法)

Western News Media & Democratic Politics

CHE Ying, WU Xian-ju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CHE Ying (1954-),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Dean,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majoring in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law; WU Xian-ju (1979-), male,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Abstract: The Western news media and the democratic politics are of depending on each other and promoting with each other. The capitalist class promoted the progress of democracy in the process of fighting for freedom of press. The news media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supervising the government, participating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al affairs, correcting wrong doings. Meanwhile, the progress of democracy is the guarantee of news media's development.

Key words: Western news media; democracy; freedom of press